

当代中国

DANGDAI ZHONGGUO
GAIGE KAIFANG SHI

改革开放史

“文革”结束后的中国向何处去/改革开放的酝酿与高层决策/改革开放在“大胆试验”中起步/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与理论建树/改革开放遭遇严峻考验及应对/邓小平南方谈话与改革开放新阶段/跨世纪的战略谋划与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观的变革与改革开放的推进/改革开放在战胜困难和风险中前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全面深化改革

| 上 卷 |

曹 普 / 著

 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

当代中国

DANGDAI ZHONGGUO
GAIGE KAIFANG SHI

改革开放史

| 上 卷 |

曹 普 /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目 录

· 上 卷 ·

第一章 “文革”结束后的中国向何处去	1
一、“文化大革命”结束时的中国与世界	2
二、揭批“四人帮”与国民经济“新跃进”	15
三、邓小平复出与党和国家政治生活重入正轨	29
四、平反冤假错案与教科文领域的拨乱反正	38
五、中国向何处去：“两个凡是”的严重阻碍	53
第二章 改革开放的酝酿与高层决策	58
一、打破思想“坚冰”：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59
二、大规模出国考察带来的冲击和震撼	84
三、国务院务虚会对改革开放的初步酝酿	100
四、达成重大共识的36天中央工作会议	119
五、正式决策改革开放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147
第三章 改革开放在“大胆试验”中起步	154
一、安徽四川引领农村经济改革兴起	155
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扩权”试点	169
三、兴办经济特区，打开对外开放突破口	177

四、贯彻新“八字方针”调整国民经济	200
五、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初步改革	213
六、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任务的完成	227
第四章 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与理论建树	268
一、“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269
二、制定全面改革纲领与各领域改革开放的展开	290
三、推进科教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320
四、对外政策的调整与“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	337
五、党的十三大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	357
第五章 改革开放遭遇严峻考验及应对	374
一、经济体制转轨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375
二、价格改革“闯关”受挫与实施治理整顿方针	380
三、国内政治风波平息与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建立	392
四、在维护稳定中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推进改革	400
五、打破西方“制裁”,应对苏东变局考验	411

“文革”结束后的中国向何处去

1976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极不寻常的一年。这一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相继辞世。毛泽东逝世后,面对复杂紧迫的形势,党中央决定,对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组成的“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这一事件,标志着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走至尽头。“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带来了沉重灾难:中外本已存在的经济科技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思想上政治上的混乱更是积重难返,各项事业百废待兴。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年里,党中央首先部署开展了揭批“四人帮”运动,同时着手重建党和国家的正常秩序,推动一些领域开始了初步拨乱反正。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和长时期“左”倾错误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难以在短期内消除,特别是“两个凡是”的推行,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左”倾错误理论和实践的惯性延续,使得党和国家的许多工作虽有所进展但又遇到严重阻碍,总体上呈现在徘徊中踟蹰前进的局面,中国发展仍然面临究竟向何处去的严峻历史抉择。

一、“文化大革命”结束时的中国与世界

(一) “文化大革命”结束时的中国政治经济图景

从政治上看,10年“文化大革命”使国家政治生活遭到巨大的破坏。“文化大革命”期间,各项政治制度与规则或残缺虚置或极度变形,党和政府各级机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组织,长期陷于瘫痪和不正常状态。作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遭到严重破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年没有召开。10年“文化大革命”严重混淆敌我,严重损害国家政权,严重践踏社会主义民主法制,造成的冤假错案堆积如山。在这场所谓的“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篡党夺权,利用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的大批中央党政军领导干部、民主党派负责人、各界知名人士和群众受到残酷迫害,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据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起诉书列举的受诬陷名单统计,“文化大革命”中,党和国家领导人受诬陷的有38人,其他中央党政军领导干部、民主党派负责人、各界知名人士受诬陷的有382人。另据中央组织部统计,“文化大革命”中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共230万人,占“文化大革命”前1200万干部的19.2%。其中,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和地方副省长以上的干部,被立案“审查”的约占同级干部总数的75%;有六万多名干部被迫害致死;集团性的冤假错案近两万件,涉及干部达几十万人。因大量冤假错案受到诬陷、迫害和株连的难以计数。^①在长时期的动乱中,作为人民民主专政柱石的人民解放军受到严重冲击,公安、检察、法院等机关被“彻底砸烂”。一些地方私设公堂、蛮横批斗、刑讯逼供、随意逮捕、派仗不停、打砸抢成风、任意抄家乃至草菅人命的现象极为普遍,人民生命财产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967页。

失去保障,整个社会生活陷入持续动荡之中。

从经济上看,“文化大革命”推行极左政策,违背客观经济规律,严重阻碍了工农业生产,使我国的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在世界的位次上不断后移,而且与许多国家发展的差距也越来越大。在“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正确原则,如发展生产力、发展商品经济、实行按劳分配、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等等,一概被当作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加以批判,鼓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批判“唯生产力论”。在生产关系上,不允许个体经济存在和发展,热衷于“割资本主义尾巴”;在分配制度上,轻视物质利益,平均主义泛滥;在对外经济关系上,批判所谓“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对外引进工作承受巨大压力。按照正常年份百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文化大革命”10年内乱使我国国民收入损失了5000亿元,这相当于新中国成立后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相当于全国40万个工交企业的全部固定资产的总和。从统计数字看,“文化大革命”10年中,有5年经济增长不超过4%,其中3年负增长:1967年增长-5.7%,1968年增长-4.1%,1976年增长-1.6%。^①1978年2月,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披露,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仅1974年到1976年,全国就“损失工业总产值1000亿元,钢产量2800万吨,财政收入400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②。GDP总量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的最核心指标,代表着一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一切社会、政治、文化、国防等事业的物质基础,没有GDP的持续和有效增长,其他方面的发展就无从谈起。从GDP总量看,1978年中国GDP占世界GDP总量的比重仅为1.8%。据专家研究计算,1952年到1978年中国GDP的实际平均增长率只有4.7%。整个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多数指标排

^①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经济发展五十年大事记》,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2、228、282页。

^② 华国锋:《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1978年2月26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人民日报》1978年3月7日。

在世界国家和地区 170 位以外,处于联合国有关部门和世界银行等组织划定的贫困线之下。

从科技文化发展上看,这场由文化领域发端的“大革命”大革“文化”的命,实行文化专制,对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摧残尤为严重,使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遭受浩劫,一大批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受到残酷迫害,百花凋零,学校停课,教育倒退,科学落后,文盲增多,文化园地荒芜,许多科研机构被撤销,在一个时期内造成了“文化断层”、“科技断层”、“人才断层”。“文化大革命”10年中,中等高等教育搞“革命”,中高等教育的考试被废除,一般的知识课程设置被打乱,中高等基础和专业知识被大量删减和简单化,正规的知识教育受到冲击,耽误了一代人知识的教育培养。很大一部分教育、科学、文化等领域的知识分子被打成“牛鬼蛇神”,许多有造诣的专家、学者受到人身侮辱,被关进“牛棚”或下放“改造”,被称为“臭老九”,知识分子斯文扫地。10年间,高等教育和中专学校少培养几百万专业人才,我国知识分子队伍建设出现了长期空白,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拉得更大。据1982年的人口普查统计,全国文盲和半文盲达2.3亿多,占全国总人口数的近四分之一。^①科技人员受到歧视,没有应有的社会地位。许多学有所成、留洋回国的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迫害。“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科学院仅在北京的171位高级研究人员中,就有131位先后被列为打倒和审查对象。全院被迫害致死的达229名。上海在科技界制造的“两线一会”特务案,株连了14个研究单位,1000多人。受逼供、拷打等残酷迫害的科技人员和干部达607人,有的被迫自杀。^②

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我国取得过一些引人注目的重大科技成就,但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与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形势相比,中国除了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968页。

^② 《惊回眸,那个春天——记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的前前后后》,《科技日报》2008年3月17日。

某些军事工业技术外,其他各方面自主的科学技术与世界发达国家,包括一些新兴发展中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差距进一步扩大,落后于发达国家40年左右,落后于韩国、巴西等发展中国家20年左右。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各发达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从20世纪初的10%提升到了50%—70%。而中国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从1952—1957年的27.78%下降至1965—1976年间的4.12%。与世界科学技术进展相比,“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的科学技术进步非常缓慢,对国民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十分有限。^①

由于“左”倾错误理论的影响,“文化大革命”还造成全民族空前的思想混乱,党风社会风气被破坏,人们的道德水准下降,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个人迷信以及各种错误思想行为泛滥,内伤所及,无形损失更大。在“左”倾思潮指导下,许多符合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做法被当作修正主义加以批判,发展生产力被批作“唯生产力论”,重视物质利益原则被批作“物质刺激”,“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黑白不明,是非混淆,使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四处泛滥,在一系列理论、政策上造成严重混乱。“文化大革命”号召“踢开党委闹革命”,全面破坏了党的组织建设,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和打砸抢分子乘机混到党内并窃取一部分权力,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遭到破坏,由此造成派别林立,以帮代党,以帮代政,严重地分裂了党政军组织和人民群众,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极大的负面作用。

实行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但“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堪虞。

先看市民生活。城市市民基本上靠工资生活。在“文化大革命”10年中,全民所有制各部门职工仅在1971年调整过一次工资,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平均实际工资的年均增长速度均为负增长,其中“三五”时期为

^① 《三十年前我们为什么要选择改革开放》,《学习时报》2008年9月1日。

-1.2%，“四五”时期为-0.1%。从1966年到1976年，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历年的平均货币工资和实际工资指数均低于“一五”期末的1957年和“二五”期末的1965年。^①1957年全国职工平均货币工资624元，1976年下降至575元，不进反退，还少了49元。^②1978年，失业的城镇青年2000万人，实际城镇失业率高达19%左右，城市居民食品消费占总其支出的比重即恩格尔系数高达56.66%。很多日常生活消费品需要凭票购买。粮票流行了40年。服装从颜色到样式，单调划一。“三转一响”（缝纫机、自行车、手表、收音机）是人人向往的“四大件”。直至1980年时，这“四大件”每百户的拥有率也只有5.5%、11.2%、15.7%、14.9%。黑白电视机的每百户拥有率也仅为1.6%；家庭电话非常少，即使按当时的公用电话计算，每百户普及率只有0.64部；而洗衣机还很少有，家庭轿车普及率几乎为零。市民住房相当困难。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住宅建设投资占非生产性投资的9.1%，而在“文化大革命”头五年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仅占4%，后五年的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也只占5.7%。人口的过快增长，加上住宅建设投资比重的下降，造成城市居民住房十分拥挤的状况。据1978年建设部对全国182个大中城市统计显示：全国城市人均居住面积是3.6平方米，182个城市中共有缺房户689万户，占这些城市总户数的35.8%。改革开放初期，上海180万住户中，按国家标准，有89.98万户为住房困难户，占了总户数的一半左右，其中三代同室的119499户；父母与12周岁以上子女同室的316079户；12周岁以上兄妹同室的85603户；两户同居一室的44332户；人均居住2平方米以下的268650户。^③住房大多没有客厅，进门就是卧室，厨房、卫生间很多是几家合用。

农村的情况也很严重。安徽农村最有代表性。“1977年6月，中央政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969页。

^② 曾培炎主编：《中国经济50年》，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年版，第897—898页。

^③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由来》（上），《学习时报》2008年9月29日。

治局会议上放映了一部只有 10 分钟的内部参考片,片中反映的是安徽农村的贫困状况。这个片子我们今天已经看不到了。当时,中央政治局迅速作出决定,要尽快派一名得力的干部去主持安徽工作。”^①随后,中央任命万里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到任以后,万里先后来到芜湖、徽州、肥东、定远、凤阳等地调研,万里后来回忆说:“我这个长期在城市工作的干部,虽然不能说对农村的贫困毫无所闻,但是到农村一具体接触,还是非常受刺激。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的样子。淮北、皖东有些穷村,门、窗都是泥土坯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②安徽凤阳县前王生产队,有 10 户人家 68 口人,其中 4 户没有门,3 户没水缸,5 户没有桌子。队长史成德是个复员军人,一家 10 口人只有一床被子、7 个饭碗,筷子全是树条或秸秆做的。

安徽农村的情况并非个别现象。改革开放初期,新华社国内部农村组派出几位记者到中西部农村调查。结果,1979 年全年农民的人均收入,最高的是山西吕梁地区,为 70 元;陇东庆阳第二,为 64.86 元;陕西的延安地区第三,为 57.2 元;榆林地区第四,为 52 元;甘肃平凉地区第五,为 47.6 元;固原和定西最低,同为 36.8 元。而按照当时的消费水平,农民年均收入只有达到 100 元才能解决温饱问题,满足最低生活需要。吕梁地区总共有 13 个县,1976 年,吕梁地区粮食总产不到 12 亿斤,人均占有粮食只有 400 多斤,口粮仅 200 来斤,人均分配收入 43 元。最穷的临县,从 1958 年到 1979 年的 22 年中,每个农民平均每年从集体分得的收入,达到和超过 40 元的,仅有 3 年,其余 19 年都在 40 元以下,最低的 1976 年仅有 21.8 元,平均一天才 6 分钱。1976 年,固原地区天灾人祸交加,全地区每人从集体分得口粮仅 176 斤;1977 年,是中等年景,人均口粮 223 斤;1978 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大丰收年,人均口粮也只有 329 斤。有 2/3 至 4/5 的农民,常

① 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新中国〉解说词》,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06 页。

② 田纪云:《万里:改革开放的大功臣》,《炎黄春秋》2006 年第 5 期。

年挣扎在饥饿线上。^①

在地处西南的贵州省,1977年是1949年以来全省粮食总产最高的一年,也只比1957年增长21.4%,而同期人口却增加了57.1%,全省每人平均占有粮食比20年前下降了22.8%,社员口粮水平下降了约1/5,只有370斤左右;收入不足40元的生产队高达40%以上。许多生产队无粮无钱,有的连种子也要国家支援,维持简单再生产也有困难。据统计,该省镇宁县1977年全县社员分配收入人均39元;1978年有48%的生产队人均口粮不足300斤,扣除口粮折款后,很多农户分不到现金,零花钱只能要靠变卖粮食,实际吃粮水平更低。^②

在广东省,虽然临近港澳,发展条件优越,但由于政策上的问题,农村也相当贫穷落后。1978年,深圳农民的人均收入134元,而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农民的年收入却是13000港元,如此大的差距,引诱不少人铤而走险偷渡港澳,从1954年至1978年,全省共有56.5万人次偷渡外逃。1979年再次发生了逃港事件,据统计,这年1月至5月,广东全省共有11.9万多人偷渡外逃,外逃2.9万多人,发生人数超过历史上最高的1962年。仅4月5日一天,樟木头收容站收容人数就达到3900多人,深圳收容站收容人数达2500多人。^③

有一组全国性的数据:1976年全国农村人均口粮比1957年减少4斤;1977年全国有1.4亿人平均口粮在300斤以下,处于半饥饿状态;1978年全国受灾,农民生活更为艰难,年人均只能吃到原粮248斤,每天人均只有6两7钱。1978年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67.71%;全国有2.5亿绝对贫困人口。另据原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统计:1978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均从

① 陈大斌:《饥饿引发的变革——一个资深记者的亲身经历与思考》,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9页。

② 陈大斌:《饥饿引发的变革——一个资深记者的亲身经历与思考》,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28页。

③ 《反外逃情况汇报提纲》(1979年6月8日),转引自《习仲勋主政广东》,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78—79页。

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 74.67 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年均收入低于 50 元;有 1.12 亿人每天只能挣到 1 角 1 分钱,1.9 亿人每天能挣 1 角 3 分钱,有 2.7 亿人每天能挣 1 角 4 分钱。^①就全国城乡居民粮油消费看,1976 年全国人均粮食消费量为 380.56 斤,比 1966 年的 379.14 斤仅多 1.42 斤,比此前最高的 1956 年的 408.58 斤减少 28.02 斤;全国食用植物油人均消费量为 3.19 斤,低于 1966 年的 3.52 斤,比此前最高的 1956 年的 5.13 斤减少 1.94 斤。^②

(二)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科技大发展

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到 70 年代中期,在中国相继经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之时,美国、欧洲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日本、韩国等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却在新科技革命浪潮的推动下实现了经济科技的迅速发展,社会面貌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

新科技革命,也称作第三次科技革命,首先兴起于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美国,到七八十年代以后出现高潮。这次科技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二战期间积累的本来服从于战争需要的军事技术转移到民用上来,使得原子能技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等尖端技术得到快速发展和广泛利用。

在原子能技术方面,1942 年 12 月,费米在芝加哥大学领导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座核反应堆,首次实现了人工控制的核链式反应。1945 年 7 月,美国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标志着利用原子能时代的开始。1949 年苏联也试爆原子弹成功。1953—1964 年间,英、法等国相继试制核武器成功。原子能技术首先被应用于军事领域,但很快在商业运用上取得重要进展。

^① 陈大斌:《饥饿引发的变革——一个资深记者的亲身经历与思考》,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9 页。

^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下),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969 页。

1954年6月,苏联建成第一个原子能电站。1957年,苏联第一艘核动力破冰船下水。1957年,美国西屋公司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压水堆型商用核电站。核电作为一种新能源,燃料消耗少、能值高,具有经济、安全、干净等长处,一进入实用阶段,就显露出了突出的经济与科技价值。1961年至1968年,德、日、加、意、比、瑞士、瑞典等国也相继建成核电站。1969年后,核电进入大发展时期。到1977年,世界上已有22个国家和地区拥有核电站反应堆229座。

在信息技术方面,1946年2月,世界上第一台电脑ENIAC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诞生,目的是用来计算炮弹弹道的轨迹。这部机器使用了18800个真空管,占地170平方米,重达30吨。它的计算速度很快,每秒可以从事5000次加法运算,是人工计算速度的20万倍。不过,耗电量也很大,每次一开机,整个费城西区的电灯都为之黯然失色。此后,计算机技术以惊人的速度发展。1958年出现了晶体管计算机。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每秒运算千万次的集成电路,即第三代计算机。1971年,世界上第一台以大规模集成电路做芯片的微型计算机在美国制成。此后,大体上每隔5—8年计算机的运算速度提高1000%,体积缩小1000%,成本降低10倍。计算机的出现,为人类开辟了一个崭新的信息时代。

在空间技术方面,空间技术又称航天技术,是一项研究和实现如何进入太空和利用太空的技术,火箭、人造地球卫星、宇宙飞船、航天飞机等的制造和发射,是它的主要研究对象,它是人类向近地球空间、太阳和行星空间、恒星空间和更遥远天体的重要扩展,是现代技术高度发达的体现。1926年3月,在马萨诸塞州的奥伯恩,美国技术专家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枚液体推进火箭,标志着人类已有能力借助于航天飞行的运载工具而去探索茫茫宇宙。1957年10月4日、11月3日,苏联相继成功发射了两颗人造地球卫星,开创了空间技术发展的新纪元。此后,美、苏两国开始了激烈的太空竞争。1961年4月12日,苏联发射载人宇宙飞船成功,人类首次涉足太空。1969年7月16日,美国“阿波罗11号”飞船将两名宇航员送上月球,是人

类历史上第一次在月球上留下自己的脚印。到 1981 年 4 月,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又成功发射。

此外,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海洋技术等也迅速发展。

新科技革命的蓬勃兴起,特别是电子计算机的普及,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和人们的生活方式,成为劳动生产率提高和整个经济增长的源泉。西方国家工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率,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为 1.7%,1950—1972 年增至 6.1%;在促进增长的各因素中,科技进步的因素在 20 世纪 70 年代约占 60%。

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美国经济高速发展,从 1961 年 1 月到 1969 年 10 月,美国经济连续上升了 106 个月,20 世纪 60 年代被称为美国的“繁荣的十年”^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经济濒于崩溃。为了帮助欧洲经济摆脱困境,1947 年 6 月,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说,提出了著名的“马歇尔计划”,为期 5 年。到 1951 年底,“马歇尔计划”提前结束。美国对欧拨款共 131.5 亿美元,其中赠款占 88%。“马歇尔计划”实施期间,西欧国家 GDP 增长了 25%。此后,欧洲经济逐步走出困境。以联邦德国(西德)为例,从 1951 年到 1971 年,20 年间,西德 GDP 增加了 5 倍多,是除日本之外发展最快的国家。法国 1951—1970 年的工业年均增长率为 5.9%。1970 年国民生产总值达 1409 亿美元,居资本主义世界第四位。^② 日本的发展更令人瞩目。1955 年 12 月,日本编制并实施《经济自立五年计划》(1956—1960 年),1960 年,又实施为期 10 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55—1960 年,日本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为 8.5%,1960—1965 年为 9.8%,1965—1970 年为 11.8%。1955—1970 年,日本的 GDP 增长了 7.2 倍。1960 年,日本 GDP 超过加拿大,1967 年超过英国和法国,1968 年超过西德,成为位居美国之后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③ 1973 年,日本的船舶、

① 宋则行、樊亢主编:《世界经济史》(下卷),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8 页。

② 宋则行、樊亢主编:《世界经济史》(下卷),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50 页。

③ 宋则行、樊亢主编:《世界经济史》(下卷),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52 页。

收音机、电视机等产品产量已居世界第一位,水泥、橡胶、汽车等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二位。

日本、美国、欧洲经济的高速发展一直持续到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前后近20年,这个时期被称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而正是在这20年间,中国与这些国家本来就已经很大的经济科技差距进一步拉大了。1965年,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总额为1387亿元,按人民币兑美元的固定汇率2.46:1计算,约合563.8亿美元;1965年,美国GDP总额为6291亿美元,日本为821亿美元,西德为984亿美元,法国为845亿美元,英国为865亿美元,意大利为522亿美元,巴西为167亿美元,分别是中国的11.15倍、1.45倍、1.74倍、1.49倍、1.53倍、0.92倍、0.29倍。1970年,中国GDP总额为1926亿元,按人民币兑美元的固定汇率2.46:1计算,约合783亿美元;1970年,美国GDP总额为9812亿美元,日本为2046亿美元,西德为1855亿美元,法国为1409亿美元,英国为1219亿美元,意大利为927亿美元,巴西为464亿美元,分别是中国的12.53倍、2.61倍、2.36倍、1.79倍、1.57倍、1.18倍、0.59倍;到了1978年,中国GDP总额为3010亿元,按人民币兑美元的固定汇率1.57:1计算,约合1917亿美元;1978年,美国GDP总额为21124亿美元,日本为9739亿美元,西德为6388亿美元,法国为4716亿美元,英国为3095亿美元,意大利为2601亿美元,巴西为1887亿美元,分别是中国的11.01倍、5.08倍、3.33倍、2.46倍、1.61倍、1.36倍、0.98倍。在这期间,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国家及巴西的GDP增长速度都超过中国。从人民生活来说,20世纪70年代末,当中国人还在为“三转一响一咔嚓”奋斗时,日本早在五六十年代黑白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这“三大件”就已经进入了“寻常百姓家”。日本的第一台电视机,是1952年生产的,中国的第一台电视机是1958年由天津712厂生产的,都是黑白电视机,中日电视机技术基本处在同一起跑线。但到了1977年,日本电视机年产量达到1500万台,成为世界第一电视机生产大国,且主要是彩电;而同年中国生产的电视机总量只有28万台。

除了西方国家之外,在这期间,中国周边原来一些比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如韩国、新加坡等,也抓住机遇快速发展,实现了经济起飞。新中国成立初期,韩国经济总量和中国的山东省差不多。但韩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大力发展国民经济,创造了著名的“汉江奇迹”。到80年代,韩国一改贫穷与落后的面貌,经济总量是山东的几倍。香港,只是一个弹丸之地,1977年,进出口总额达到196亿美元,而当年整个中国内地的对外贸易总额仅有148亿美元。^①

(三) “旧的那一套”实践证明不成功,“不改革就没有出路”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是一个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存在巨大发展差距的中国,也是亟须振作,奋起直追的中国。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但是,如上所述,“文化大革命”时期搞的这种社会主义,难道就是我们千百万共产党人流血牺牲所要追求的那个社会主义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如此体现的吗?按照这样的社会主义继续发展下去,社会主义还有吸引力、号召力、凝聚力吗?中国的老百姓能够答应吗?中国还有希望吗?每一个关心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人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邓小平更是如此。从第三次复出伊始,他就对“文化大革命”所呈现的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这种“优越性”打出了沉重问号。

1977年12月26日,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和夫人乔伊斯时,邓小平说:“林彪和‘四人帮’反对马克思主义,他们不讲生产,谁讲发展生产就说谁是修正主义,那马克思写《资本论》是干什么的?”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社会主义是一种比资本主义更加优越的社会制度。“怎样才能体现列宁讲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什么叫优越性?不劳动、不读书叫优越性吗?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如果这叫社

^① 国务院办公厅[1978]12号参阅文件:《港澳经济考察报告》(汇报提纲),1978年5月31日。